



博士论丛

殖民主义统治 与农村社会反抗

——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

李安山著

COLONIAL RULE
AND RURAL
PROTEST: A STUDY OF THE
EASTERN PROVINCE IN THE
COLONIAL GHANA

湖南教育出版社





博士论丛

殖民主义统治
与农村社会反抗
——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

李安山著

COLONIAL RULE
AND RURAL
PROTEST: A STUDY OF THE
EASTERN PROVINCE IN THE
COLONIAL GHANA

湖南教育出版社

殖民主义统治 与农村社会反抗

——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

李安山 著

责任编辑：聂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2.25 字数：310000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55-3031-1/G·3026

定价：18.7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Colonial Rule and Rural Protest:
A Study of the Eastern Province in the Colonial Ghana**

ABSTRACT

This is a study of social protes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the Gold Coast Colony. It deals with four types of protest: the people agains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commoners against chiefs, religious leaders against the secular authority and lesser traditional leaders against Paramount Chiefs.

Colonial rule was an encroachment on the African daily life. In 1910, the Forest Bill was passed by the Government to set up forest reserves. The Gold Coast people regarded this Bill as an intrusion on their land tenure and protested against it. I have studied this successful struggle carried out by the chiefs and the educated Africans. Another daily life issue concerned cocoa. A cocoa disease called swollen shoot, found in 1936, devastated cocoa trees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ne chapter studies the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the disease, the resistance against cutting-ou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rotest. The second type of protest is that of commoners against chiefs.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Ghana has generally focused on two indigenous political forces: traditional chiefs and western-educated elite. The commoners, however, organized as Asafo compani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local politics, especially in the frequent destoolment of the chiefs who abused their power. The third subject is the protest of religious leaders against secular authority.

The close tie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traditional system seemed to have been weakened in the modern period. Under colonialism, priests' power decreased and they cam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ef. It is natural for them to voice their discontent in every opportunity. The fourth type of protest was that of the lesser chiefs against their Paramount Chiefs. By imposing an authority structure upon the Gold Coast, the British neglected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indigenous system. They took the chief as a tyrannical monarch and disregarded other strata in the traditional ruling class. This policy generated resistance from lesser chiefs.

Dealing with legitimacy, form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al protes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in the period of 1904—1952, this work argues that colonialism is after all a situation of paradox; protes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local politics and in most cases caused changes in colonial policy. In challenging the colonial establishments, social protest converted African traditional commoners into political actors an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movement.

序言一

前任加纳驻中国大使科乔·阿穆一戈特弗里德

非洲和亚洲的国家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先后沦为殖民地。因此，我们的人民是带着沉重的民族耻辱和苦难进入本世纪的。殖民主义不仅打断了其他国家基本社会结构演进的自然程序，而且也阻碍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及其思想在文化道德水平上的正常发展。

我们的人民对殖民国家极力推行的同化企图进行了抵抗。他们为要求自决和受到尊重的权利进行了斗争。他们为真正获得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遭受了侮辱，却为我们赢得自由、自我保存和尊重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牺牲。

我与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李安山教授所在的中国已有很长的联系了。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为他的著作《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撰写序言，这样可以为他的著作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我对中国的兴趣始于1949年，当时革命性的变革正在发生。自1959年以来，我有机会多次访问这个伟大的国家。从1994年到1997年，我有幸担任加纳驻中国大使，这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认识。我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值得的和丰富的经历。

我是在北京担任大使期间认识李安山教授的，因而有机会与他讨论很多问题，其中也包括他的著作。他对阿比瑞瓦运动和阿萨夫团队的研究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从我们的多次交谈中，我

在认识自己国家历史的各个方面受益匪浅。

我们仍然记得，非洲与中国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反对殖民主义和巩固政治独立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奥萨吉耶弗^① 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于 1961 年 8 月对中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即是这种友谊的明证。当时双方签订的友好条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潮流中的最重要然而也是最不为人注意的发展之一是：当我们迈向 21 世纪时，建立在今天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中非关系正在迅速地扩大和发展。

加纳主要的传统诗人之一、已故的加纳国家发言人^② 奥基亚姆·博阿弗·阿库弗 (Okyeame Boafo Akuffo) 曾经向国父克瓦米·恩克鲁玛表示由衷的敬意。他赞扬奥萨吉耶弗具有恢复力的创造性，正是通过这种有恢复力的创造性，恩克鲁玛激励着加纳传统和现代的知识分子从深层的底部抢救我们集体自我的历史和知识，而这种历史和知识正是本地和外来的破坏者竭尽全力想永远埋葬的。

这样，伟大的奥基亚姆重新肯定了那种“皮埃托比图丹塔” (“Pieto betoo danta”)，即：“在外国闯入者到来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完整的文化认识论和存在主义的全部财富，这些财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人，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的结晶。”

毫无疑问，艺术源于确定性，它同样也源于非确定性。我的一位非裔美国人朋友莱伯特·贝休恩 (Lebert Bethune) 在他的一本名为《为自己的护符》(Juju of My Own) 的诗集中试图把握并反映这种人生经历的确定性与迷惑，特别是一个被奴隶制和殖民

① 英文为 Osagyefo，原意为“武士”、“胜利者”，后来表示“教皇”，是对恩克鲁玛的尊称。

② State Linguist 是加纳的一种专门的官职，并非一般国家的发言人的意思。它在古代是作为国王代言人的职称，后来又成为与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专职人员的官职。在独立后这一称号仍然保留，是一种荣誉很高的职务。

主义割断了其故土非洲的文化源泉而又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非洲人的经历。他的诗歌谈到各种确定性，尤其是关于一种坚定信仰的确定性：当具有非洲祖先的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尊重他们血肉之躯那活动着的源泉——非洲——时，折磨他们的那种自我排斥和心理流亡的痼疾将得到医治。我发现贝休恩那部诗集中的主要诗歌“我自己的护符”非常有趣。他提到的那种痼疾不仅存在于生活在海外的非洲人移民社群之中，同样也存在于一些没有离家的非洲人之中。

制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护符
因为我厌烦了外来的幽灵
它们那冷清的尸体
生活在我血液的青春火炉之中
永远成了我的命运
因此，她——我的奶奶——曾经警告我
一遍又一遍
每当我重新点亮她那双闪烁有神的小眼睛

将古老的爱掷入我的幼年
每当我打断她那温和的口音——
那口音就像她焙烤的那种柔韧的红粘土
她就哼起了对我唱的那支唯一的催眠之声

“我不在乎巴克拉·卫普 (Bakra Whip)
我不在乎弗姆—弗姆
来吧护符来吧”

因此我正在设计这件东西
属于我自己的护符

从她的生活和我们的欲望里
我将自己的命运焙烤进催眠曲之中

“我不在乎巴克拉·卫普
我不在乎弗姆—弗姆
来吧护符来吧”

奥萨吉耶弗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的这种受灵感支配的创造性又将另一位追随者引到了前沿，他的著作将填补我们丰富历史中的某些空白。

李安山教授完成的这一工作是第一流的。他为确认和理解黄金海岸人民的真实历史而进行的极为成功的研究具有更大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位中国学者愿意探寻我们那种被人认为是黑暗的心灵深处。他的声音比很多甜美的保真性磁带更为清晰。

这一学术著作的作者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极具启发性。这一研究包括黄金海岸社会反抗的主要形式，较低层的社会力量对高层政治权威的反抗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反抗的传统作为黄金海岸传统社会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的伟大意义，特别是殖民权利机构竭尽全力歪曲和扼杀这些反抗的种种企图，和最终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革命性转型以及这些反抗对黄金海岸争取自由斗争的影响。

作为一种特有的例子和个案研究，这一著作对于研究和理解类似的个案提供了一种模式和规范。

将对李安山这一著作的评价集中在学术性这一个方面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不管这部著作的学术性多么重要，有必要强调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的所有重要部分、用词、语气、立场及精神上，李安山表现出他自己至少是以人为中心，更多则是以非洲人为中心的。他的著作并非致力于自我陶醉之爱的结晶，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寻找、发现、确定并传播关于

世界上的受苦人^①中间的非洲人民解放的真理。

用他的这一重要著作，李安山给那些致力于非一亚团结和国际主义的预见者们带来了荣誉。为了挽救那些有关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自己的崇高知识和真理，他敢于驳斥那些非洲知识界中的刽子手的论调；他比大部分学者研究得更为深入。我们这个民族，既不隐瞒自己的缺点，亦有能力在过去和现在作出聪明睿智的成就，因此也值得真诚和具有人道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也值得将真理解放出来。

这部著作的涵盖面极宽，具有深度并富有感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既有广度又富有创见，因而对不断增长的文献作出了及时的贡献。所有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部著作。

于加纳·阿克拉

① 著名的非洲革命者和哲学家法农的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的题目正是《世界上的受苦人》(F. Fanon,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Paris, 1961)。此处作者有意取自这一说法。

序 言 二

美国非洲研究学会前会长马丁·A. 克莱因

在西方的大学里,对非洲历史的科学研究是最近才开始的。本世纪50—60年代,在非洲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非洲国家的独立,非洲历史研究既受到这一运动的激发也与之同步。在这一个时期内,这一学科的主题是驳斥殖民主义者关于非洲历史的臆测。这些臆测中最为常见的一个观点是:对殖民征服的任何抵抗是过时的非洲社会对历史力量的毫无作用的努力。

这一观点首先遭到了尼日利亚历史学家肯尼思·翁伍卡·戴克的批判。他指出,对英国19世纪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渗透最有效的抵抗来自非洲近代商人,他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为保持对自己市场的控制而战斗。对殖民主义正统史学更广泛的挑战来自特伦斯·兰格和他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同伴。他们认为:抵抗是合理的行为,它有效地影响了殖民统治的成形;在早期抵抗者和现代大众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这些著作激发了一系列关于抵抗运动的研究,既有非洲学者的,也有外国学者的,有的重点研究对殖民征服所进行的抵抗,有的则研究在反抗或暴动被镇压后非洲人民继续抵抗的途径。

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独立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建构的紧迫性密切相关。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希望给自己定位并力图将民族主义运动的渊源根植于自己的早期历史之中。然而,随着独立运动联盟中各种集团开始表达各自的利益并互相对立与攻

评，非洲及其他地方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抵抗远非仅仅是对殖民统治的抵抗。杰拉尔德·卡普兰指出，在南部非洲存在着一种“对保护的争夺”——即受到威胁的上层分子为了防范本社会内外的各种敌人而与殖民国家结盟以寻求保护。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与人类其他社会一样，非洲社会也存在自身的矛盾，人们因意识形态不同或各自利益相异而分化为各种集团。

在一篇著名文章^①中，艾伦·艾萨克曼和巴巴拉·艾萨克曼认为，这种内部矛盾和相互斗争决定了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反应形式。精英们往往对外来的威胁似乎并不在意，而更注意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本社会其他上层分子、“年轻人”或穷人的挑战。艾萨克曼认为，对殖民统治的抵抗往往与进行抵抗的社会之内部矛盾密切相关。与此同时，研究者不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著名的早期反抗上，同时也研究那些阻止殖民政府的专横行为和致力于改善非洲工人、农民和妇女工作条件的各种运动。例如，在不同的情况下，非洲人举行示威、罢工、将经济作物压住禁卖，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袭击殖民政府代表或焚烧殖民政府总部。李安山的著作可以列为艾萨克曼提出的这种研究框架之内。

当安山首先向多伦多大学提出（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时，我们很高兴能够就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对话与交往作一点贡献。我校非洲历史课程的大多数学生来自非洲。长期以来，我们的兴趣不仅仅是培养学者，同时也致力于思想的交流，并通过学习其他社会的传统和历史经验而加深相互理解。李安山没有辜负我们希望。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坦诚地与加拿大学者和非洲学者交流各种思想和看法。到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他选择了“农民反抗”。来自富有深厚的农民传统特别是农民反抗历史的中国，这一选题似乎使得他可以从对中国农民历史的理解来探

① 此处指艾萨克曼夫妇发表在1977年《国际非洲历史研究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第10卷第1期上的文章。译者注。

究非洲农民的经历。中国历史的这种相关性对加纳更为突出，因为这里已存着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农民阶级。

然而，李安山很快发现，那些人们所反抗的问题并非全是农民的问题。加纳人的反抗出于多种原因。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他们对酋长——这一殖民统治的工具进行抵抗，他们为确定地方的权力而斗争；他们反对那种专横地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现代农业科学。安山的论文题目很快从“农民反抗”（peasant protest）改为“农村反抗”（rural protest），尽管这一涵盖面更大的题目仍然不得不忽略一个事实：个别反抗运动甚至有一些城镇居民的参与。

这一研究课题内涵丰富，它抓住了将普通民众推向反抗运动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加纳人所关注的问题。李安山的论点十分明确：加纳社会运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结束或改善殖民统治，而是为了保卫本土文化和宗教；特别是，正如他自己十分恰当地概括的那样：“保卫弱小者以反对强大者。”他同时强调：正如独立并不意味着与殖民时期彻底决裂，殖民统治也并非与前殖民主义时期彻底决裂。在本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年轻人组织^①是前殖民主义时期加纳地区的一种重要组织，在独立后的加纳它们仍然在起着作用。（这大概就是历史学家们反复强调的“历史的延续性”吧！）

李安山的研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当面临任何一个所研究的社区的某一种独特的历史经历时，历史学家切忌生搬硬套一种既定的模式。这一点十分重要。一种分析的构架是重要的，但它必须受到过去事实的检验。李安山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出色。

我对能指导这一篇博士论文感到自豪。同时，我也为那些对非洲感兴趣的中国人能读到这一著作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九九八年七月 于多伦多大学

^① 即“阿萨夫团队”（Asafo company），译者注。

前 言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对于任何人来说，有关知识或心智的工作是不可能独立完成的，这本书的完成实得益于很多学者的帮助。值得我感谢的人远比书后所列“主要参考文献”的著作者为多。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我的导师、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马丁·克莱因(Martin Klein)。他从60年代初即开始从事非洲历史研究，曾任剑桥大学《非洲历史杂志》咨询委员会委员和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会长。从我抵达加拿大的第一天起，他和他的夫人就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后来则关心我的家庭)。他照顾我的衣食住行，指导我选择有关课程及授课老师和博士论文的选题，安排我赴英国伦敦和加纳首都阿克拉查找档案资料的旅行，启发我对农村社会反抗的宏观思考，关心我的助教和研究工作。同时，他以一位历史学家特有的那种敏锐批判力，对我的研究不断提出质疑进而使我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这些无疑给我留下了远比历史知识更为宝贵的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用他和他妻子的名字给我的两个孩子起名的缘故。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杰克·格尔森(Jack Gerson)虽然早已退休，但一直像父辈那样关心照顾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到了中国，全力支持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后来，他又完成了关于中国晚清时期的博士论文。这些经历使他成为加拿大的第一批“中国通”。我是在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认识他的。作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

们这些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的“三教九流”正在拼命地力图夺回失去的光阴。格尔森先生是外籍教师，他教学过程中的那种近乎苛刻的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到加拿大后，他又主动和我联系，从学业、生活、工作和社交等方面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并成为我家的常客和以干辣著称的“湘菜”的欣赏者。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建议。他们是：美国非洲研究学会前会长、加纳问题专家、乔治敦大学社会学系的人类学教授格温德林·麦克尔（Gwendolyn Mikell），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尔顿·以色列（Milton Israel），政治学系的教授乔纳森·巴克（Jonathan Barker）和宗教学系的教授C. T. 麦金太尔（C. T. McIntire）。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我的论文进行了严格的审定，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我在论文的翻译和修改过程中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一些学者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了各种帮助。加纳大学历史系的阿多-费宁（Adoo-Fening）博士、伦敦经济学院的加雷思·奥斯丁（Gareth Austin）博士和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的加纳学者阿科·奥科洛（Ako Okoro）先生对论文的部分章节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索撒尔（R. J. S. Southall）博士将自己收集的有关卡德伯里公司的研究资料（共一箱）托马丁·克莱因教授转交给我。挪威特隆赫姆大学的贾尔·西蒙森（Jarle Simensen）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寄给我参考。已故的巴塞尔传教团档案馆的保罗·詹金斯（Paul Jenkins）先生为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并将自己未发表的论文寄给我。他们这种严谨的学术批评精神和资源共享的无私态度无疑将影响我以后的学术生涯。

1993年夏季，我有幸访问加纳。在此期间，一些加纳朋友尽力在各方面给予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我抵达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而不知所措时，我的一位加纳朋友的父亲贝杜（Badoe）先生亲自驱车将我接到他家住宿；他们夫妇俩的热情款待使我在非洲土地上第一次体会到非洲人的殷勤好客。约瑟夫·孟萨（Joseph

Mensah)和他的朋友们在我抵达阿克拉的前几天陪伴着我。我的师弟纳纳·布鲁库姆(Nana Brukum)友善地将我接到他家,他的妻子和女儿将我当做自己的亲人;这使我可以声称具有比别的学者更难得的经历——和非洲人家庭生活在一起。吉米(Jimmy)兄弟将我带到恩萨瓦姆——从事可可种植业的首批村镇之一,使我有机会观察和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

加纳国家档案馆的奥莉维亚·科波多(Olivia Kpodoe)女士、特尔玛·埃武塞(Thelm Ewusie)女士、加特鲁德·波奇维(Gartrude Botchway)女士、朱迪思·波奇维(Judith Botchway)女士、弗兰克·阿布罗斯(Frank Abloth)先生以及加纳大学巴姆图书馆(Balme Library)和非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友好便捷的服务。我还要感谢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约翰·费恩(John Fynn)教授、科菲·巴库(Kofi Baku)博士和非洲研究所的所长克瓦米·阿辛(Kwame Arhin)教授,他们为我的住宿和研究提供了各种方便。我在机场、车站、市场和饭馆碰到的友好和热情款待使加纳这一美丽的国家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多伦多大学的7年学习生涯是值得我深深怀念的。我在多大历史系的师兄师弟(他们均已顺利完成学业,使我可以在他们姓名之后加上“博士”头衔)扎奇鲁克(P. Zachernuck)博士、阿卜杜拉(I. Abdullah)博士、罗克尔(S. Rockel)博士和帕尔塞夏(J. Palsetia)博士经常与我就农村的社会反抗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有时甚至是面红耳赤的争论)大大激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我的加拿大朋友琼·韦尔(Jean Vale)小姐对我的英文原稿进行了润色。在多大的中国留学生梅江海和徐军生夫妇、李海金和付乐元夫妇、张向民博士等朋友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各种各样的帮助。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和多伦多大学校友会提供的资助使我得到英国和加纳进行调研活动。我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度过了

整整两个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未发表的官方文件。档案馆的科学管理、大众服务和管理员的负责态度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牛津大学的罗兹图书馆、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以及多伦多大学罗巴茨研究图书馆的馆际互借部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热情而周到的服务。我对帮助过我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我要对热情友好的加拿大人民和政府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慷慨资助,此项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生导师吴秉真先生。作为燕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她是我国最早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之一。是她将我一手扶上了非洲历史研究的启蒙之路。我也要感谢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陆庭恩教授,他一直关心着本书的出版。我的朋友、中学和大学同学聂乐和先生一直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曾师从我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以及瞿林东先生、朱仲玉先生,专攻中国史学史。我回国后,他一直鼓励我将博士论文翻译出版。这次他又主动担任责任编辑,必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对这位忠厚学长的关心和鼓励表示由衷的谢意。

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资助使这一学术著作得以出版,我对这种支持学术研究的义举表示感谢。值得提出的是,本书的第一、二、四、五章的部分曾作为论文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2期,1998年秋季)、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国际非洲历史研究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8 : 2, 1995)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宗教历史杂志》(*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ol. 20 : 1, 1996)发表过。我感谢版权持有者——波士顿大学、澳大利亚《宗教历史杂志》协会及其版权保护者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Blackwell Publishers)和《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准许我将上述论文的有关部分作为本书的内容。

我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作为教师,他们对自己事业的苦苦追求深深地感染了我。特别是父亲,他那渊博的学识、正直的